



軍事倫理規範與實踐探討 「文人主導軍事的越戰」

陸軍中校 郭晃男

提 要

- 一、研究探討美國在越南戰場上付出足堪「動搖國本」的慘痛代價後依舊苦嚐失敗苦果？筆者試由「軍文關係」、「軍媒關係」、「軍民關係」等三個面向，探討美國這場史上最為慘烈的戰爭中，在軍事倫理之規範與實踐上，不論於戰場上抑或其本土境內，遭遇諸多之問題與困境，究其為政府、媒體、民間所延伸之衝擊與影響。
- 二、由此三個面向所涵括到的現象，探究成因與問題核心，其中值得參考與借鑑之處，藉由越戰中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使國軍官兵對於軍事倫理在軍文、軍媒及軍民關係的面向中，可以有完整且正確的概念，俾利國軍官兵對於軍事倫理廓而清之的概念並據以實踐篤行。

關鍵詞：軍事倫理、越戰、媒體

前 言

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在2018年元月16日FREEDOM IN THE WORLD 2018年公布評估的195個國家中，88個國家(45%)被評為自由國家，58個國家(30%)部分自由，49個國家(25%)不自由。根據報告評比，我國在滿分100分中，拿到93分，較去年的91分高出2分。以1最自由到7最不自由為評估標準，我國整體自由度為1，獲最高評價。「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個單項都得到1的最自

由評價，新聞自由度也列入自由。¹

古今中外，軍隊在國家的政治發展上一直都扮演著舉足輕重角色。《左傳》成公十三年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華民國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歷經帝國主義荼毒、軍閥割據、黃埔建軍、剿共、抗日，及至1949年因共黨叛亂而播遷來臺，嗣後積極經濟發展及民主憲政的努力，開創了經濟奇蹟與民主活力。申言之，若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用以評斷自由、民主程度的各項標準來看毫無疑問的，從1990年代

1 《2018世界自由調查報告》－危機中的民主 (Traditional Chinese)，2018年1月16日，〈<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2018-traditional-chinese>〉（檢索日期：2018年1月20日）。

中期以來，我國已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² 全球「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典範。³ 隨著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以及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與鞏固，「軍隊國家化」與軍隊接受民主機制的監督與文人領導，遂成為軍隊倫理中的重要議題。

軍隊倫理屬於專業(團體層面)應用倫理的範疇，是在一個既定的社會架構下，探討專業組織作為的善惡、是非；換言之，「軍隊倫理」即是以軍事組織作為主體，其要旨在明定軍事組織應有的道德關係和規範，以維持軍隊角色及社會秩序的穩定與發展。簡言之，「軍隊倫理」係以軍隊為焦點，著重闡明一切與軍事組織作為有關的道德問題，訴之於人的理性而訂出軍事組織作為應有的道德規範。

而軍隊倫理的規範即「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所探討的重點，「文武關係」就狹義和特定的政治意義而言，它意味著「軍隊與合法建立的國家公共權威機關之間所存在的主從關係」，涉及軍隊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或軍人在政治上扮演的角

色。⁴

進而言之，軍隊倫理的重要性，是維繫民主政治運作與維護民主價值的安定力量，這股力量的展現，除了相關法令規章的外控制約外，更存有軍隊團體共同文化與精神的內控作用。事實上，從西方「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重要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主張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⁵之論述都在於強調軍隊對於國家安定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性，為使民主政治得以穩定發展，軍隊必須走向專業、政治中立、接受文人領導，以及文人政府必須慎防軍人的干政，以避免其影響或危及國家整體運作、安全與發展。

承上所述，吾人當可得知「文武關係」的微妙之處與重要性，而存在於軍隊中的「軍隊倫理」乙詞，簡單來講就是軍隊與「政治」和「社會」的互動標準及規範；也就是軍隊與文人官員體系(政府)間，以及軍隊與人民間的互動方式與規則(如與遊說、壓力(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⁶或者與大眾傳播媒體間的互動方式與規則；因為有了這些

2 Arend Lijphart著，高德源譯，《民主類型—三十六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類型與表現》(臺北：桂冠出版社，2004年1月)，頁i。

3 Thomas Carothers 在2002年1月Journal of Democracy期刊中指出，台灣已被列入全球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典範。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1, 2002. p.521。
蔡政廷，〈我國民主轉型之軍人角色〉，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軍事社會科學專刊第11期》(桃園：國防大學，2013年10月)，頁181。

4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9月)，頁5-9。

5 Samuel P. Huntington,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利益團體乃是一個有組織的社團，目的在於影響政府的政策或行動。利益團體與政黨相異處在於前者試圖從外部來發揮影響力，而不是贏得或執行政府權力。此外，利益團體傾向關心某特定範圍的利益，不像政黨有廣泛的計畫。

互動方式與規則，使得文人政府與民眾能夠秉持著這樣的互動方式與規則，進而對軍隊產生信任度。

美國邇來一直視「民主」為其不變的立國精神，其民主政治更是充分反映民意的政治體制，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所著《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乙書即指出：

「我們要享受新聞自由帶來的好處，就需忍受新聞自由帶來的壞處」。⁷美國的民主是以公民社會為基礎，如此允許公民高度自治和公共輿論充分發展的社會中，任何極端的主張都會受到抵制。民意的表達可以根據其方向和強度的不同，形成多種影響決策的模式，在近代美國政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表達較為鮮明的案例，當屬1965到1975年所發生的越戰(Vietnam War)。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何以美國在越南戰場上付出足堪「動搖國本」的慘痛代價後依舊苦嚐失敗苦果？筆者試就「軍文關係」、「軍媒關係」、「軍民關係」等三個層面來探討美國於這場史上最為慘烈的戰役中，有關軍隊倫理之規範與實踐上，不論於戰場上抑或美國本土境內，所其遭遇諸多之問題與困境，究竟為政府、媒體、民間帶來了哪些衝擊與影響，並由此三個面向所涵括到的現象，探究成因與問題核心，俾使國軍官兵對於軍隊倫理廓而清之的概念與實踐。

案例陳述

一、越戰源起

越南戰爭(以下簡稱越戰)，源自1945年的法國重掌殖民政權，止於1975年的南越戰敗亡國，全期前後共歷時三十年之久，戰事主要高峰期在於1965年，此為受美國等反共陣營國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國)對抗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共產主義陣營國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又稱越共)的一場戰爭。主戰場在越南境內，以及寮國、柬埔寨等兩國，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參戰人數最多、影響也最重大的一場戰役。⁸

根據日內瓦會議的決議，南、北越暫時以北緯17度線分治，越南北部由胡志明統治，南部由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廷琰在西貢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世稱南越。按照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規定，統一國家的選舉定於1956年7月舉行，但是這場選舉卻沒有舉行。同時北方也沒有同意進行選舉。最後，美國和南北越雙方都沒有簽署協議中的選舉條款，也因此當時越南實質分裂的狀況，就像分裂中的朝鮮半島一般。

回顧這段歷史，自1954年5月法國殖民政權軍隊在奠邊府被越共擊潰後，交戰雙方於同年7月21日簽訂「日內瓦協定」(Geneva Accords)，⁹法國旋即撤出中南半島；1960

⁷ Alexis de Tocqueville著，董果良譯，《民主在美國》(商務印書館，1988年12月)，頁286。

⁸ 阮連項，陳亦亭譯，《對越南戰爭的誤解》(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9月)。



年，北越在「國際共黨」的支援下，開始南侵，進行所謂的「解放越南」戰爭。其手段，就是以北越為基地，建立一條能避開「停戰線」，而又能直接支援南越共黨游擊隊長期作戰的「補給線」。

1959年，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武裝統一越南，並派遣大量軍事人員前往南越組織武裝顛覆。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它由反吳廷琰政府的各派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都需要在「國際共運」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因而都積極支持北越對南方進攻。

最先開始援助南越的美國總統是艾森豪，後續由甘迺迪總統開始支持在越南作戰，甘迺迪派遣一支特種部隊進駐南越，開啟了美軍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的先河。到了1966年底，越共在南越的兵力經常能保持在30至40萬間，而且還建立了9個軍區，並控制了南越大部分的鄉村與三分之一的人口。這條穿過崎嶇山地與原始密林、能躲過美國空中偵察的作戰與補給路線，就是俗稱的「胡志明小徑」(Ho Chi Minh Trail)。¹⁰

美國在「圍堵」共黨勢力擴張的戰略考

量下，早在艾森豪總統時代，即已對南越實施軍事及經濟援助。¹¹1964年美國詹森總統在東京灣事件後即積極擴充軍備以介入越戰，1965年2月27日詹森總統發表白皮書，向美國人民及全世界昭告介入越南戰爭的原因，當時美國民眾沒有強烈反對意見。然而隨著戰情逐漸升高，美國涉入越戰也愈來愈深，駐越美軍從1965年底的18萬人增加到1968年的49萬5千人，而且美軍在越南陣亡的人數已近4萬人，軍備消耗更是佔了美國大部分的軍事預算。¹²就在社會各界、媒體、聯合國與世界輿論不斷抨擊美國的行動同時，要求改變參戰政策的呼聲及國內反戰情緒的高漲之下，社會日趨分裂，詹森總統終於在1968年3月31日宣布放棄競選連任。

二、發展歷程

美國自介入越戰以來，雖然不惜投入大量的物資與軍力，去進行一場遠距外的國度戰爭，然卻始終堅持「圍堵政策」下的一種「有限戰爭」，而非「戰必勝」、「攻必克」的致勝戰爭。依照美國原有的想法，美軍祇要能夠在北緯17度線以南「圍住」北越游擊隊並予以消滅，即可算是戰略上的成

9 法國撤出中南半島，結束其對「印度·支那三邦」，即越南、高棉(柬埔寨)與寮國(老撾)的殖民統治。越南則自北緯17°線(非軍事區)為界，分割為南、北兩部。北部為胡志明領導的共黨政權「越南民主共和國」，簡稱北越或越共，首都河內；南部則於1955年10月26日，由美國主導，廢黜法國殖民時期的傀儡政權「保大王朝」，成立「越南共和國」(簡稱南越)，首都由中部的順化，遷至南部的西貢。

10 胡志明小道又稱胡志明小徑(Ho Chi Minh Trail)，越南亦稱「長山道」，是1959年由北越國家主席胡志明下令開闢支援南方作戰的通道，繞道寮國、柬埔寨境內，可從北部榮市經過中部非軍事區通往南方戰場，故稱為「胡志明小道」，也使越戰擴大至寮國、柬埔寨境內。

11 George Doneleson Moss, "Vietnam: An American Ordeal", (N.J.: Englewood Cliffs, 1990), pp59~60

12 周曼琳，《民意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的角色-兩個個案的比較》(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頁2。

功，也就達到勝利的目標，爾後便可高奏凱歌榮歸。¹³然而，事與願違，始終抱持著「有限戰略」理想的美國，卻也因此而墜入泥淖，直至脫離越南戰場前，自此陷入一場漫無止境的「消耗戰」中，導致最終造成兵疲馬困、經濟衰退、社會不安與人心反戰的嚴重連鎖惡性反應。¹⁴

1965年2月，美軍在波來古基地遭到攻擊，美國空軍隨即發動第一次報復性打擊。3月8日，3千5百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岬港登陸，成為第一批進入戰區的美軍戰鬥人員。7月24日，一架F-4C被擊落後，詹森總統將在越美軍提升至12萬5千人；翌日第101空降師的4千名人員進入越南。11月27日，五角大樓要求提升美軍數目至40萬人以便執行計畫中的大規模掃蕩行動；到了年底，美軍在越數目已高達18萬4千人。到了1966年八月，已有多達42萬9千名美軍士兵駐守在越南。

1968年1月20日，當南越百姓正準備歡度農曆春節前夕，北越軍隊共計動用了24萬軍隊，同時對南越的35個主要都市發動攻擊。這場代名為「Tet」所謂的「春季攻勢」，¹⁵一共有兩波，第二波的攻擊目標更擴大到46個城市，美國幾乎無法抵禦。越共的這次行

動，也讓詹森總統猛然醒悟，如此的戰事已無再繼續打下去的條件；此時美國政府與人民真正想做的一件事，已不再是如何「拯救越南」，而是趕緊從深陷在越南的泥淖中儘速脫困。

1968年3月22日，詹森為了緩和國內的壓力，先撤換了駐越美軍司令，再於31日忍痛宣布退出年底的總統大選，停止轟炸北越，欲在所剩之任期內，透過和談，致力謀求戰爭的結束。1969年1月20日，尼克森就任美國的37任總統，為「順應民心」，開始尋求自越戰中抽身的方法。5月8日，尼克森與南越總統阮文紹在中途島舉行會談，會談直後便宣布由越南分批撤軍，將戰鬥的任務交還給南越政府與人民，這也就是尼克森總統的「越戰越南化」政策。¹⁶

1972年3月30日，正當美軍如火如荼自越南撤軍之際，越共又動員了30萬配有俄製火箭、飛彈、坦克與重砲的北越正規軍，在南越境內共黨游擊隊的配合下，於南越發動了被稱為「Nguyen Hue Offensive」的另一次更大規模「春季攻勢」。越共的攻勢在五月下旬後逐漸退潮，惟零星的小戰鬥一直持續到9月才完全結束。¹⁷

13 胡璉，《出使越南記》(台北：中央日報社，1978年1月)，頁82。胡璉，國軍一級上將，1958年「金門砲戰」時之金門防衛司令官，後任我國駐南越大使(1964~1972)。

14 Robert J. McMahan, "Major Problem in History The Vietnam War", (Florida,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0), pp. 227~30。

15 自美軍介入越戰後，越共每年都在雨季來臨前的春天，對南越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全面性攻擊，稱為「春季攻擊」。

16 越戰越南化是尼克森總統推行的越南政策的核心，1969年5月14日，尼克森總統在全國電視講話上，第一次詳細的闡明了越南政策，第一次提出了美國關於談判的「八點計劃」，越南化並不是談判的替代辦法，而是對談判策略起促進策略的另一種策略，即「以代促談」的策略。Henry Kissinger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全集(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1月)，頁342-343。

北越則由於受不了美國長期的B-52轟炸與港口的布雷封鎖，終於透過「巴黎和談」(Paris Peace Talks)，同意全面停火。1973年1月27日，由美國、南越、北越及PRG(Provision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即共黨在南越境內建立的「南越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四方面在巴黎簽訂「協定」，規定次日起越南全面停火，60天內美軍完全撤出越南，南北越協商舉行大選，以和平方式統一越南。

尼克森事後宣稱：此為「越戰越南化」政策下的一項「光榮和平」，而一手促「巴黎協定」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季辛吉，且因此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¹⁸然而，統計美國直接以軍事介入越戰九年，在越南戰場上付出的代價是5萬6千餘名美軍陣亡，1千5百億美元(當時幣值)軍費的支出，此一堪稱「動搖國本」的慘重代價，超過任何一個國家為他國事務所能付出的最大限度。在越南國內，媒體常採用「對美救國抗戰」的名稱，並用以區別其他越南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爭。¹⁹越南人至今對此次戰爭的正式名稱仍有所爭議。然而，由於戰爭的國際性，當今越南國內外的學者已開始漸

次接受「越南戰爭」(越戰)這個稱呼。

三、結果影響

越戰是20世紀60至70年代的一場重大戰爭，雖然其戰場只限於南越之內(加上轟炸北越)，但其背後實有國際大國的支持，可說是冷戰時期表現在區域性大國間的角力。南越的一方，固然美國為主力，但也聲稱受東南亞公約的支援。南越共黨實際上是北越的化身，而北越的一方，除一貫受中共的支持外，真正對北越具決定性作用的是蘇聯。因為只有蘇聯所輸送的先進武器，才足以應付美國龐大火力，並支持10年之久、最後取得勝利。

北越勝，美國敗，這樣的結果對東南亞以至世界局勢都有很大影響，茲將軍事上的影響略述如下：

(一)越共強大，控制柬、寮

越戰後，北越不僅實質控制了整個越南，且對原有安南三邦的其餘兩國老撾及柬埔寨亦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柬埔寨。柬埔寨在越戰時，其國王施漢諾偏袒越共。當美軍對越共進行征剿時，越共往往逃入柬埔寨的鸚鵡咀地方，而柬埔寨則一再抗議美軍迫入柬境，使越共有庇護之地。

17 同前註，頁342。

18 季辛吉1923年出生於德國，曾在美國尼克森和福特總統任期，擔任美國第56任國務卿，也是美國歷來最出色的外交官。1977年獲得象徵美國國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1986年獲得自由勳章。1973年，他與北越的黎德壽(Le Duc Tho)因共同協商1973年的《越南和平協定》而獲得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然諷刺的是在一年半之後(1975年)越南卻「淪陷」。導致後來有兩位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委員辭職，以抗議將該和平獎頒給季辛吉與黎德壽。黎德壽在1973年曾拒絕接受這項榮譽。季辛吉以他6萬美元的獎金，設立一個獎學金基金會，作為在越戰中陣亡或失蹤的美國軍人子女的獎學金。

19 同註14，頁342-343。

其後，施漢諾被推翻、流亡中國。柬埔寨由尤諾將軍建立了一個親美反共政權，但為時極為短暫。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柬埔寨共黨，將尤諾政府推翻，美總統福特自然無法及無意再施援手。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共取得政權後，實行了激進的、對舊政權官民的激進手段，驅離百萬計的首都永珍(或稱萬象)人民於野外，致全國600萬人中，死者幾近三分之一。

(二)加深中、蘇、越共之間敵意

由於越南在扶植洪森政權後，²⁰駐兵柬埔寨10萬。越南受蘇聯支援而取得勝利，因而將金蘭灣租借予蘇聯海軍使用，使蘇聯艦隻得以首次在東南亞有一基地。同時，由於中蘇共交惡，且分別支持柬共及越共；越共在戰後，因同時取得蘇聯及美國(原由美國援助南越者)的現代化軍火，自認為「全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不將中國大陸放在眼內，經常侵擾中國大陸廣西邊疆。故在1979年，中國大陸不得不發動「懲越之戰」。²¹

(三)東南亞國家紛與共黨國家改善關係

越戰之後，由於美國自越南抽身，過去與美並肩作戰，堅決反共、特別是反越共的泰、菲等國，為求自保，不得不與昔日之死

敵改善關係。因而在其後的短短幾年間，各國先後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東南亞公約亦從此解體，區內各國組成了經濟性的「東南亞協會」，²²東南亞公約組織便正式瓦解。

至於美國方面，由於越戰對其損傷甚大，直接地使其損失數十萬寶貴生命及數百億美元戰費，使本已走下坡的經濟更形困難，迫使尼克森總統於1971年宣布美元貶值。此外，由於尼克森曾為結束越戰努力而訪問中國大陸。在美國外交政策改變後，中美外交有了新的突破。終於在數年後達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也逐漸醞釀了美國「拉中反蘇」，大打「中國牌」的美國新外交政策。

案例分析

一、軍文關係的危機

當詹森1963年繼任總統時，事實上也等於承接了一場棘手的戰爭，這是場他不知該如何獲勝，但卻絕不能輸的戰爭，沒有人想要輸。但軍、文官員間對於該如何運用軍事武力呈現出諸多不同的看法，且由於軍費暴增的關係，也導致國會不再全然支持行政部

20 1952年8月5日生，自1985年1月14日就任柬埔寨首相兼人民黨領袖，他是現今東南亞國家中在位第二最長的国家領導人。

21 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爆發在中國和越南之間的一場戰爭。中華共和國稱之為對越自衛還擊戰，在民間被習慣稱作對越自衛反擊戰、懲越之戰；越南則稱之為在北部邊界打敗侵略戰爭。在短暫侵入越南北部之後，中共軍隊在一個月之內撤出了越南。中方和越方都宣布取得了戰爭勝利。這場戰爭使中、越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到最低點，並使大量華裔越南人繼續逃亡。

22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簡稱: ASEAN), 也叫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亞細安組織(亞細安)及東南亞合作組織(東合), 是集合東南亞區域國家的一個政府性國際組織, 預定2015年成立「東協共同體」。

門的政策。

詹森總統向來支持並恪遵甘迺迪前總統的政策，並也親自到過越南，且盛讚越南總統吳廷琰是「東南亞的邱吉爾」。²³詹森也特別留心，避免重蹈杜魯門總統的覆轍，²⁴然而打從戰事一開始，美國的軍事以及文人領袖，在有關越戰的本質以及如何處理這場戰爭的看法上，就已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多數文官認為，問題的徵結點係南越政府在施政以及軍事上長期的積弱不振，而北越援助南方盟友之作為，並不具有決定性之影響，誠如甘迺迪前總統在1963年9月3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確實來說，這是他們的戰爭，他們是唯一在乎戰爭勝敗的人。」²⁵

文人與軍人高層在軍事武力運用方面也時有衝突的問題發生，在「核子嚇阻」、「摧毀敵方城市」與「人口為目標」的核戰略(countervalue)等理念上，國防部長麥納瑪拉(McNamara)以及其他手下策士們，對於展示決心、限制，以及升高衝突方式等問題的看法，較諸軍人將領們的意見，明顯取得優勢，並贏得這場理論性的辯論。由於核子武器的運用將會帶給人類巨大災害，因此文人領袖決定要透過限制性手段，以設立防火線等方式，將使用它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然而軍事將領們卻看不出此限制性的

攻擊行動有何助益，他們認為不論在理論或是實務上，要使敵軍及其領導最高階層臣服的不二法門，就是對其實施大規模的攻擊，參謀聯席會議甚至呈送一份備忘錄給麥納瑪拉，敦請其減少對軍事行動的限制。同時也建議由軍方來接手主導戰爭以及美國援助計畫，並且「在越南人的掩護下，運用美國的資源」來從事空中轟炸。

軍文關係之間對於如何處理這場戰爭的看法始終南轅北轍、紛爭不斷，「武官」總在催促著要攻擊更多的北越目標，但「文官」卻不予採納，並試圖說服「武官」同意減少增援部隊的數量，在這樣一來一往的拉距中，常常只看到「糾葛」，卻不見「成效」。1967年5月19日，國防部長麥拉瑪拉甚至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反對「武官」們採取更強勢行動的建議，僅同意增加3萬名士兵；因此當戰事持續至1967年的春、夏之間時，許多美國文官們對於這場戰爭已漸次不抱以任何希望。

「武官」受挫於戰爭的膠著狀態，並對「文官」們不支持他們的專業看法感到憤怒，於是他們將此一情緒向國會部門來宣洩，最後導致這位國防部長必須參加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於1967年8月所舉辦的公聽會(為期8天)，並於會中提出證詞。由證詞中大

23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NY: Ballantine, 1993, p135.

24 杜魯門容忍共產黨徒接收中國、派遣美軍隊至韓國進行地面作戰、忽略中共將會介入的警告，不得不開除他手下頗受歡迎但卻難以駕馭的軍事指揮官—麥克阿瑟，以致於因為輿論不支持他的軍事政策，而輸掉了韓戰這場戰爭。

25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65).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p.992.

家才知道，原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所建議的359個目標中，僅有57個被核准，比例不到兩成；部分高階將領，如海軍上將大衛・麥當勞(Admiral David McDonald)為了要表示抗議，甚至想要在戰爭期間辭去職務來表明心志，最後在逐漸失去總統以及參謀首長們對他的信任狀況下，1968年的2月，這位任期最久的國防部長，終於離開了五角大廈。也由於「軍」、「文」兩者間，始終存有異心，也直接埋入了戰事失敗的種子。

二、軍媒關係的危機

雖然大眾媒體在報導越戰消息時，和政府偶有發生摩擦情事。但在越戰初期，媒體的立場大多和政府相同，對越戰表示支持。這樣的報導立場和內容相對影響民眾對於越戰的支持和認同，使得在越戰初期時，民意對越戰的觀感都顯示正面且樂觀。平面媒體除了紐約時報以及華盛頓郵報等對越戰表示支持外，各大雜誌也表示類似立場，而當時美國的電視已極為普及，作家Michael Avlen將民眾直接接收媒體戰爭報導的現象稱作是「客廳的戰爭」(The living room war)。²⁶越戰是歷史上頭一個透過電視媒體報導的戰爭，同時也是美軍與媒體間開始產生衝突與彼此不信任的一個開端。²⁷

越戰剛開始時，政府刻意避免以軍力直接介入戰場的事件模糊了其他焦點，其新聞運作方式就是將議題鎖定在此為「回復越南

的民主自由」所進行的一場戰爭；因此，就軍隊與媒體，以及媒體政府間的關係上，產生了下列兩種影響層面：第一、對媒體的戰爭採訪，同意以較為寬鬆的方式來進行，有關「審查機制」上並未有所謂的「但書」與「制度」，欲進行採訪的記者，祇要能夠提出保證，並同意恪遵軍事機密與安全的原則下即可，也就是說，在越戰初期，由於軍方的作法十分符合所謂「新聞自由」的理念，是以軍隊與媒體雙方剛開始的關係算是相當融洽，也因此越戰是美國媒體首度被准許可隨軍採訪卻又不會遭到嚴格審查而羈絆的第一個軍事行動，後來便被作家丹尼爾稱作是「未受審查的戰爭」(The uncensored war)；第二、由於未能在政治意涵上達成共識，是以媒體的報導相當多元，各家媒體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同屬於全面戰爭的一個部分，而是由該家媒體自行依照政治新聞報導的原則來報導戰爭新聞。

承前所述，美軍為了要營造良好的軍媒關係，僅對媒體提供一些訴諸道德性的自我規範要求原則與事項，並未律定相關的管制措施與作為；此外，美軍另採用較為主動的方式，由在西貢的國防部官員於每天下午五點鐘舉行定時的戰爭進度說明會，藉以提供媒體記者有關戰事的消息，美軍採取「報喜不報憂」的片面樂觀方式來發布軍聞，其雖與媒體所見所知略有不同，然因軍媒雙方

26 Michael Avlen, 《War Reporting & Technology》，參考網址：<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檢索時間：2017年1月9日。

27 Sharkey, J. (1991). Under Fire: U.S. Military Restrictions on the Media from Grenada to the Persian Gulf.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在初始階段的互動尚稱良好，是以當時兩者均能「各取所需、各盡其能」，對於自身所欲達到的「成效」咸感滿意，媒體也多能配合國防部「樂觀」的一面來報導，然事實上如此方式並未能讓國內百姓獲得最真實的訊息。

由於地理環境因素的關係，越戰各大、小戰役多屬游擊戰的形態，因此當記者甫入西貢市區未幾，便即進入了所謂的「戰場」，放眼望去，周遭盡皆戰場，在戰爭初期軍媒關係良好的階段，這是各家媒體過去所不曾有過的體驗。然而「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在管制寬鬆的狀況下，記者諸公們祇要持有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護照，甚至僅是與媒體的一封信，就都可以獲准採訪，且採訪的內容也大開方便之門，幾乎讓媒體完全「自由揮灑」，過去「配合報平安」的作風與習性，隨著戰事的進展而逐漸明朗化之際，媒體的報導方式也開始有了不同的內容，而問題也慢慢開始浮現。

美國軍方對於媒體採取極為寬鬆的開放立場，但在越盟(北越及共軍)的春節攻擊(Tet

offense)後才開始轉變。²⁸伴隨媒體大量報導越戰的消息，特別是透過電視媒體將美軍傷亡戰場實況及無情的戰爭畫面，帶入到美國每一個家庭後，間接促成美國國內反戰活動的盛行，而其主要分界點就是越盟的春節攻擊。²⁹

三、軍民關係的轉變

美國之所以會介入越南，主因在於1949年10月首由中共取得中國大陸的政權，緊接著南北韓爆發韓戰，在亞洲突然所興起的共產勢力讓其感到芒刺在背而倍覺威脅，美國於是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Geneva conference)後正式介入越南問題，³⁰甘迺迪總統上任後，於1961年12月15日發表聲明，隨後至1962年期間，將美軍駐越之軍事顧問從316名增加到1萬1千餘名，也自此正式而直接的介入了越南問題。

整體而言，美國民眾在1960年初期對越戰的關心程度以及認識都未見深入，一直到1963年發生佛教徒自焚事件，³¹經美聯社記者布朗(Malcolm Browne)的報導，媒體將消息和照片傳回國內，自焚的照片立刻震驚全國以

28 1968年對美國來說是關鍵的一年，反戰運動與伴隨反戰而來活動遽升，甚至影響改變了政治、選舉與政黨勢力，而變動的起點就是1968年初發生在越南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至此之後戰爭再也不只是發生在鄉村、山間、叢林等偏遠之地，而是進入了南越城市。

29 胡光夏，〈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復興崗學報》，第89期，2007年6月，頁93-94。

30 法軍於奠邊府(Dienbienphu)之役戰敗後，為了結束戰爭，法國乃邀請蘇俄、中共、越共的代表在日內瓦開會，並於1954年7月21日簽訂停戰協定，以北緯17°為界，北方歸越南獨立同盟，南方歸越南政府，法軍撤離回國，被迫放棄這塊與其他在東南亞境內的殖民地。因日內瓦停戰協定簽訂時，美國並未參加，但為了阻遏共黨勢力擴張，乃於1954年9月邀集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等國，簽訂「東南亞防禦公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代替法國介入越南，支持越南政府。

31 1963年的佛教徒自焚事件導因於當時南越的獨裁者吳廷琰由於本身信奉基督教，所以不允許當地懸掛旗幟，導致佛教徒抗爭而引發衝突，有一名佛教徒因此自焚表達抗議，但南越卻置之不理。

及國際社會，³²越南的問題才開始出現在報紙版面和電視上。即便如此，民眾對於越南仍然一知半解的比例極高，甚至連越南在什麼地方都不清楚。當時多數美國民眾所在意者是國內的種族問題，其次是國際問題，如前蘇聯的威脅以及核武限制等，再來則是民生經濟方面的問題，

美國大部分民眾對越戰的支持度，雖然在1966年進入白熱化階段時，已不再像開戰之初一面倒的予以支持。但就總體上而言，民眾對越戰的情勢仍咸表樂觀，民調依舊顯示民眾對美國有信心能夠處理好越戰問題，直至1967年時，民意開始產生較為顯著的變化。1967年初時，民意支持越戰以及詹森的比例仍然高於反對者，未料同年年底時，民眾對於詹森的反對已開始超過其支持度。1968年1月30日凌晨，由北越發動「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美國人民逐漸發現戰況的事實並不是像先前政府所透露的那般樂觀，經過電視畫面的傳遞，代表著美國精神的大使館周邊竟然散布著越共和美軍的血腥遺體，包括紐約時報以及華盛頓郵報在內，多家媒體均採用此慘狀的彩色照片來當做報紙封面，³³增添了民眾反感的程度，反戰的氛圍於是開始蔓延了起來，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民眾對於軍隊的支持開始節節衰退，進而影響民眾對於越戰的支持。

案例啟示

一、軍文關係：回歸專業、分層負責

從軍文關係面向探討，越戰對美國在軍文關係上所造成的傷害極深，除了使得在政治上形成決裂，不僅在戰火正熾之時如此，多年以後的揮之不去的後遺症亦是如此，甚至對2004年的總統大選也形成了不良影響。

「文人統治」(civilian control)，³⁴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熟知慣稱的「文人領軍」，此為民主國家維持民主政治體制的根本。英、美等民主國家，其政府體制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便是「文人凌駕於軍隊之上」(civil supremacy over the military)，簡稱「文人至上」。軍隊的職責在於保家衛國，而非統治國家；政策由文人決定後交付軍人執行，文人決定政府政策之目的，軍人則被限定方法，嗣後再予以執行；武裝力量必須由民選的文人官員來領導和掌控。如此律定的目的，主要是讓國家將其價值和目標，以及在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方式上，係植基於人民的意志基礎上，而非來自維護外在安全軍事領導者的選擇。

簡言之，這場戰爭可說是對於「愛國情操」的試金石，其中最值得借鏡之處便是，在如此大規模的戰爭中，軍文間的意見不合最終將造成沒有齊一目標的痛苦結果。一個擁有強大軍力與國力的國家，因為軍文關係

32 王明雄，越戰時期大眾傳播媒體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碩士論文(台北：私立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1987年)，頁72。

33 Kathleen J. Turner(1985), Lyndon Johnson's Dual Wa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18

34 曹陽，〈論我國「國防二法」文人領軍之設計〉，《復興崗學報》，93期，2009年12月，頁3

的不融洽與不信任，甚至彼此猜忌而敵對，在無法「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情形下，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就是內部處處掣肘，無一致的目標與理念。

就軍方而言，當他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在叢林奮戰之際，大部分的軍人都認為文人領袖並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導致讓他們身處如此危疑震撼的環境，並且透過殘缺不全的戰鬥方法，來錯用他們如手足一般的袍澤弟兄，使得被那些政客在派遣任務後，最後卻遭到遺棄在戰場上的悲慘命運，讓他們遠離家園來獨自面對敵人，即便戰後以軍事角度來檢視許多大小「戰役」的成效時，其實在「戰場」的本質上並未達失敗之境，然在軍文不和，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情形下，最後使得美國輸掉了「戰爭」。由此適足凸顯「文武」關係的融洽與否，在維繫國力上可說是至關重要。

隨著「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的制(修)訂執行後，國軍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上已奠定良好的基礎並邁入一個新的紀元，由越戰期間存在於美軍文武關係之間的問題上來看，我們可以獲得幾點認識：

首先在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文人統制，其意涵是軍隊負責「保衛國家」而非「統治國家」，政策理當由文人來決定，而後交由軍人來執行。軍隊必須由文官來領導和掌控，文人決定政府政策的目的，軍人則限定在方法的決定上；第二、民主政體必須具備一些

基本條件，才能使得文人統治能夠成功地運作，而軍人必須接受文人至上的信念，心悅誠服地接受並服從文人政府的領導。第三、文人統制的運用，主要透過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控制，在預算、立法、決策、監督和人事等都是直接而有效的方式。

因此軍人在心態上而言，吾等所謂的「軍事專業人員」，身處在整個政府機制系統內的運作上，不能停留在一種被動和中立的角色上。我們必須能夠基於對民主社會網絡中軍人和文人的優先權有充分的瞭解，並適時的判斷來表達觀點，瞭解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並在法制規範下積極參與活動，祛除長期以來的封閉僵化心態和思維，接受民主社會多元化、人性化管理和容忍批判及接受監督的民主素養和文化價值，當軍隊的民主法治素養愈高時，自然就愈能凝聚軍心，愈能樂於接受文人的領導，進而構建出一個和諧的文武關係。

二、軍媒關係：國安至上、議題管控

由前述探討越戰「軍隊與媒體」的危機，透由兩者的互動，吾人可從中得知，如果民眾的反戰意識已日漸高漲時，就會帶來要終止戰爭的政治壓力，壓力一起，連帶也會在「文武關係」上起了微妙的變化，如此一來，戰爭也就會很容易失敗。³⁵

其次，在電子媒體方面，電視畫面的影像有能力隨著不斷放送的狀態下，進而提升反戰的意識，同時極可能進一步會干擾到合

35 王俊南，〈新聞自由VS國家機密：美軍案例探討及對國軍的啟示〉，《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28期，2012年6月，頁88。

法武力的使用，甚至是政府部門的正當性。電視畫面傳送所具有的立即性很容易會帶給閱聽人負面的印象與情緒，鑑於在越戰期間所獲得的寶貴教訓經驗，適度的限制作為有其必要與重要性。

雷根政府記取越戰時期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對政府資訊的管制都採取較為嚴密的作為，為了要防止政府資料外洩，甚至還對涉嫌提供資料給媒體的官員實施測謊，並要求實施官員的安全查核以及簽署終生不得洩密的切結。軍隊與媒體間的關係由越戰時期的「自由放任」關係，最後轉變成有限度的關係，爾後的「巴拿馬戰爭」(1989年)、第一次波灣戰爭(1991年)、阿富汗戰爭(2001年)、第二次波灣戰爭(2003年)，均循此模式來加以管制媒體的採訪。

媒體就像是水，可以載舟，也能覆舟，由於在越戰爭期間，美軍從越戰中所獲得的啟發主要有二：首先，如果在己方的反戰意識日漸高漲，就會帶來要終止戰爭的政治壓力，而戰爭也就會失敗。其次，電視的影像有能力來提升反戰的意識，以及干擾合法武力的使用，甚至是政府的正當性。電視的立即性會帶給閱聽眾負面的印象與情緒。此後，美軍對於電視對發動戰爭的影響的關切日益成長，而在後來美國所介入的每一個衝突中，包括：Grenada(1983)、Panama(1989)、Persian Gulf(1990)、Somalia(1992-1993)、Haiti(1994)、

Bosnia(1992-1995)、Kosovo(1999)、Timor(1999)與Afghanistan(2001)等，都可以見到政府與軍方靈巧的運用媒體(特別是電視)作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戰爭工具。³⁶

三、軍民關係：恪遵法紀、塑造形象

軍民關係產生關鍵性的改變，主要原因就是前述探討人民、民意對於政府派出軍隊出兵實際上並非「師出有名」，而北越在發動「新春攻勢」後，之所以能夠扮演如此舉足輕重的原因，主要在其嚴重影響了越南的戰局以及美國普羅大眾的觀感所致，民眾對於開拔至遙遠亞洲國度的軍隊不再相信其為「仁義之師」，他們根本就是政客百般盤算下的犧牲品。

也由於越盟春節攻勢的發動，1968年遂成為整個越戰過程當中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對美國來說同時也是一個複雜且多變的年份，在歷經長期的戰事與國庫巨大的損耗之後，民眾對這整起戰爭的反感愈來愈強烈，民眾不僅對戰爭失去信心，而且相當不滿政府的表現，積壓許久的情緒於是便從示威遊行和抗議活動中爆發開來，因而引發多起校園以及市區的暴力衝突。

美國在越南上所花費的時間、人力、物力與金額確實令人咋舌，也儘管政府不斷向人民傳達信心，但時間一再流逝，戰爭卻依舊彷彿看不到盡頭，導致民眾與政府和軍隊間的關係降到冰點，而遍存於社會當中彼此對立的情形頻仍且日趨嚴重，經濟狀況亦不

36 胡光夏，〈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復興崗學報》，第89期，2007年6月，頁93-94。



斷下滑，讓民眾的忍受度達到極限，輔以媒體不斷報導在北越「新春攻勢」下，美國所遭受到困境與慘狀的催化下，不滿戰事的民意迅速上揚，終於導致詹森總統在1968年3月31日的電視演說中，公開宣布尋求對越南新的和談政策，並表達不再競選連任，就此終止其政治生涯。這也就是古諺所說：「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³⁷的道理所在。

若要在軍民關係上論就有何參考與借鏡之處，可從人民民意的重要性為出發點來探究。「民意」兩字係涵括人民的意見與意念，此為全體人民針對事件所表達之群體意見，主要目的在於影響政府，藉以順應人民的要求與冀望，並形塑成對人民有利之決策；當民眾不滿政府的政策，其所體現出的外在態度與意見表達，就是寄望可以透由民意的影響，使得政府對於該政策來做出調整或改變。

越戰後期逐漸失去民心的支持後，美國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均體認到發動戰爭絕非兒戲，亦非如提議某法案一般的單純，這全都必須要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方可奏功。時序若能倒回，當初的決策者若能深體「成也民意，敗也民意」的深層意涵，充分涵泳「軍民關係」之間的重要性，相信在充分取得民眾信任，且經過深思熟慮後所擬定的周延性政策下，越戰最後的結局不會是以那樣的模式來劃下句點。

結語

根據美國統計，從1965年開始空炸至1973年《巴黎和約》規範美軍撤退為止，美國陣亡人數達5萬8千人，傷兵則有卅萬人之譜，然這些僅是人員的損失，整個在戰場上，以及國家戰略層級的敗退，對美國所造成後遺症的影響可說是既遠且深。

首先，民眾長年以來所引以為傲的自信心澈底受到動搖。始終扮演著世界和平警察角色的泱泱大國，就這樣栽在彈丸小國越南的手中，如此結果對於美國人而言，在內心所造成的衝擊力度難以言喻，他們也自我檢討地將這場戰爭的失敗，有很大的一部分必須要歸咎於「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消極態度上；前線將士在不能齊一心志的狀況下，將原本所具有的整個力量全數整合，導致最後敗北的難堪結局。

其次，就民主國家而言，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兩者應該是目標一致、相輔相成的；真正的新聞自由應有助於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亦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礎。政府固不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處處限制新聞自由；媒體亦不應濫用新聞自由，置國家安全及公眾利益於不顧；唯有彼此良性互動，民主政治才能順利運作發展，國家方得以在安定中求發展。

再者，國軍現階段新聞政策，係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國防利益為前提，凝聚「全民國防」共識與建立軍民良好關係為要求，配合

37 語出《大學》傳十篇，釋治國平天下。

政府政策與國防施政為原則，達成國軍使命與現階段軍事任務為目標；平時：藉由新聞的發布與刊播，爭取民眾對國防施政之瞭解與支持，進而建立全民國防共識，協助國軍達成各階段軍事任務；戰時：運用新聞媒體的宣傳力量，傳播有利戰訊暨政府政策、立場，對內激勵國軍官兵士氣，促進全民團結向心；對外爭取國際友邦支持，瓦解敵人戰鬥意志，俾贏得作戰勝利。³⁸

最後，本文從美國在越戰慘痛的戰役中，有關軍事倫理的面向，檢視「軍文關

係」、「軍媒關係」、「軍民關係」等三個層面中，其中又有哪些值得吾人參考與借鏡之處，藉由越戰中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讓國軍官兵對於「軍隊倫理」的各種面向可以有完整的概念，並據以實踐篤行。

作者簡介

郭晃男中校，中國文化大學政研所博士候選人。曾任連、營輔導長、政戰處長。任職於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中校教官。



美國空軍C-17運輸機。(照片提供：郭元宏)

38 國防部編印，《國軍新聞工作實務手冊》，民國95年4月，頁1。